

身体·文字·图像：唯物史观视域下记忆媒介演进及其当代启示

陈 瑜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5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16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4日

摘 要

身体、文字和图像可被看作人类“语言”的三种主要形态，三者记忆传承与历史书写中相互交叠和转化，并在叙事功能、认知效果和记忆构建上呈现出本质差异。身体语言是人类历史记忆传递的起点，具有即时性、在场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但其叙事作用因身体和语境依赖性而十分有限；文字语言开启了历史记忆大众化、世俗化的传播时代，具有固定化、抽象化和线性化的特征，也导向记忆力的萎缩和记忆的垄断；图像语言是人类记忆的一次更为彻底的解放，具有具体性、直观性和意象性的叙事特征，既延续了身体语言对在场性的持有，又具备文字语言的物质化存档优势。以图像语言为基础的影像叙事的崛起，为历史唯物主义应对语言媒介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也为当今数字媒介时代的历史记忆构建提供了批判反思的新场域。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记忆，身体语言，文字语言，图像语言

Body, Script, and Image: The Evolution of Memory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Yu Chen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ugust 15,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6,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4, 2026

Abstract

Bodily, script, and image-based language can be regarded as three primary modalities of human “language.” In the processes of memory transmission and historical inscription, they intertwine and mutually transform, yet they manifest essential divergences in narrative capacity, cognitive impact, and mnemonic construction. Bodily language, which initiates the transmission of human historical memory, bears the traits of immediacy, presence, and integrality; nevertheless, its narrative efficacy remains severely circumscribed by its corporeal and contextual dependence. Script ushered in an era of popularized and secularized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featuring fixity, abstraction, and linearity, yet it simultaneously led to the atrophy of mnemonic faculties and the monopolization of memory. Image-based language represents a more thoroughgoing emancipation of human memory, distinguished by concreteness, intuitiveness, and imagistic narration. It not only preserves the quality of presence inherent in bodily language but also enjoys the material archival advantages of script. The rise of image-based visual narratives has offer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respond to the shift in linguistic media, while simultaneously furnishing a new arena for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present digital age.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emory, Bodily Language, Script, Image-Based Langu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语言开启了人类记忆的外在化进程。记忆的首要意义是“留存”，即信息能够突破单一时空限制被后来者再次获取。记忆的消逝意味着集体经验的断裂，因此记忆需要“代具”来实现自身。斯蒂格勒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将人类的记忆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第一持留(第一记忆)、第二持留(第二记忆)和第三持留(第三记忆)。第一持留(第一记忆)是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当下的体验；第二持留(第二记忆)是对过去时刻的整理和回忆；第三持留(第三记忆)是借助物理载体将流动的、易逝的时空体验固定下来，是记忆的外在化、物质化形式，即技术性“代具”([1], p. 50)。作为符号系统或能力的“语言”本质上不属于第三持留，需要肢体动作、书籍、照片等物质形式进行承载和转化。这些物质形式是促成人类记忆外在化的因素，具有不同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特征，会反过来影响语言的意义生成机制，进而作用于集体经验与记忆的形成及传播过程。

从历时的动态的角度看，人类传承记忆和记录历史大致经历了身体、文字和影像三种范式，分别对应着身体语言时期、文字语言时期和图像语言时期，但三者之间并非绝对的界限分明、前后相继的替代关系，而是在庞杂的历史中相互交叠和转化的交映关系。

2. 身体语言：记忆的“即时性”和“在场性”

身体语言包括无声的肢体语言和有声的发声语言。肢体语言是人类最早、最基础的传播方式，是通过行为表演与动作模仿直观再现狩猎、休息、危险等场景，传递具体的经验和信息的语言。手势、表情、姿势、舞蹈、仪式等都是肢体语言的具体形式。但由于纯粹肢体语言为主导的时期过于久远和原始，因

此其作为记忆媒介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发声语言是以声音为媒介的身体语言，依赖呼吸、声带、口腔等身体器官传播信息，包括口传史诗、神话、歌谣、故事等。发声语言是身体作为记忆媒介的主要形式。

关于语言的具体起源，目前学界并无统一的定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发展了人类的大脑和肢体，改善了原始人的发音器官，提出了使用语言的社会需要，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生理条件和社会条件。人类在日益丰富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不断转化成记忆，记忆的留存与传递的需要推动了语言的产生。但语言并不是一开始便具备成熟的符号系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人类起源到距今约 5000 年为传播学史所定义的前文字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统一且可广泛应用的外部存储手段和符号，集体经验主要依赖生物性的身体来保存和传播，被称为人类的身体语言时期。记忆在这一阶段是一种形成条件与提取条件高度耦合的具身行为，即经验通过身体的物理与情感过程刻入肌肉和神经系统，储存在人脑之中，并通过身体在特定情境中的再表演达到再现效果。例如，能人通过观察和模仿将“如何把石头砸出锋利边缘”的程序传承下来，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记忆的身体表达。随着社会复杂度提高，一部分身体动作逐渐被仪式化，剥离了实用功能而成为纯粹的符号。这种演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意味着身体语言不仅能传递精确的经验，还具备承载抽象神话与权力关系的功能。由此可见，“身体”作为人类最原初的记忆载体，构成了人类历史记忆传递的起点。

在音节语言诞生后、文字符号出现之前，讲故事是人类口头文化最核心的象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距今约 300 万年至 1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是史前文明的“蒙昧时代”，“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 ([2], p. 33)。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将狩猎经历、祖先事迹、自然现象与神话传说代代传递，由此形成了最早的叙事传统。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诗经》和《格萨尔王传》，都是发声语言时期诞生并流传至今的古老叙事。这些故事源于人类意识的有限性和对记忆准确性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原始欲望的生动展现，它们既是信息交流的载体，也是实现群体认同的重要方式。

身体语言具有独特的时空属性。首先是即时性，体现在记忆的编码与解码在时间上同步，说话、舞蹈或手势发出的瞬间即是记忆被唤醒与传播的时刻，信息输出与接受之间几乎不存在时间间隔；其次是在场性，身体语言叙事要求物理空间的共在，记忆的传递依赖于面对面的视觉、听觉乃至触觉的全感官参与，这种共在使记忆呈现为被经历的状态；再次是整体性，身体语言不是孤立的符号系统，而是与情绪、姿态、空间方位、群体动力等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仪式中的步伐、弯腰、凝视同时承载着情感、社会关系甚至宇宙观念；最后是非线性，身体语言是多个意义轨道同时展开的，手势、表情和发声所传递的信息在同一时间轴上并行，并随着讲述者的情感和听众的反应而调整，多重记忆信号可以相互叠加、拆分重组。以发声语言为主的身体语言时期所构建起来的是一种听觉的共同体，声音是事件性的，它标示着存在。“讲故事的社群特征与其他交流方式的社群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它需要讲故事者和听众之间的‘经验的同化’，这是一种通过相互陪伴才能获得的过程。这种经验交流发生在集体听众和讲故事的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中。” ([3], p. 27) 在一个听觉文化主导的社会里，记忆的真实性来源于在场的共鸣，因此听信比怀疑更符合认知和记忆习惯。

身体语言的独特属性也造就了其在记忆上的局限性。一方面，人类的发声能力和生命长度有限，因此口语所能到达的空间范围十分狭窄，记忆活动与生产劳动直接同一，具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特点；另一方面，语境依赖性以及无法独立存档的脆弱性，使单纯依靠身体语言的社会无法积累复杂的历史叙事，也无法实现跨越代际和地域的批判性反思。为了克服这些缺陷，人类很早便开始使用画符符号进行沟通和记录。这是一种牺牲在场性换取精确性与传播性、牺牲即时性换取可重复性的尝试，也是文字语言和图像语言的原始雏形。在这一过程中，身体语言从前文字时代的主导性记忆媒介，逐渐降为文字语言与图像语言的辅助媒介。

3. 文字语言：记忆的“空间化”和“线性化”

在语言学中，根据字符与语言单位的关系，文字可以划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体系。表意文字是指字符直接表达意义，与读音无必然、固定联系的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基本都由原始图画符号演变而来，例如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古埃及文明的圣书字、中国的甲骨文等。这些文字最初的发明是为了满足记事需求，在使用过程中逐步演变成精简且体系化的成熟符号系统。汉字是众多古老文字中唯一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说文解字》中概述了汉字的六种造字方式，分别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表明中国汉字的造字过程具有象形的基础；表音文字是指字符用于表示语音中的音节或音素的文字，这类文字本身不具备意义，只有通过拼读才能产生意义。约公元前 1700 年形成的腓尼基字母是目前公认最早的字母文字，经由希腊人的改造成为后世几乎所有字母文字的源头。原本诞生于图画符号楔形文字，也在发展演化中不断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靠拢，并在公元 1 世纪左右被拼音文字所替代([3], p. 62)。

文字语言的产生同样是人类实践发展的结果。距今约 1 万年至公元前 4000 年，人类进入野蛮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工逐渐细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开始分离，人类对跨时空的信息传递的需求进一步增强。“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2], p. 37)文字的发明是身体语言的第二次抽象，人类把连续、多模态、情境化的具体身体经验，转换为离散、视觉可读、语法规约的符号序列，并通过对文字的阅读解码实现记忆的再呈现。希腊人发明出元音系统，使书面语能够精确记录口语中的全部声调，从而为哲学、科学、戏剧等复杂记忆形式奠定了基础。18 世纪活字印刷术和 19 世纪电报的发明，使文字语言彻底打破了记忆滞留和呈现的时空限制，极大地节约和解放了人类的记忆力。生理极限的突破不仅开启了逻辑思维的可能性，更为跨越时空的代际文明传承创造了条件。“《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4], p. 3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达 30 次提及约翰·古登堡的印刷术及印刷机诞生对现代精神交往和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也反映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字语言对人类文化塑造和记忆传承的重要作用。

文字语言具有固定化、抽象化和线性化的特征。首先，文字将流动且转瞬即逝的经验转化为排列有序、可反复审视的固定符号，让记忆得以脱离生物载体，实现物质化的储存。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的意识流是有限的，记忆滞留和编码的过程同样也是遴选和遗忘的过程。人类的意识本身就依赖于第三持留来构成时间，否则便无法形成稳定的记忆，也无法构建连贯的历史并向未来投射([1], p. 50)。而文字语言的固定化符号使历史记忆的连贯叙事成为了可能，也使个体记忆真正汇聚成集体记忆；其次，文字语言意味着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和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与身体语言相比，书面语言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间接的，需要通过文字来代表声音，然后声音再指向概念。这种分离使文字符号具备更丰富的能指，广泛地表达抽象概念，为人类大量记载经验提供可能；最后，文字语言所使用的固定符号具有精确性、规范性和形式性，能够把流动的经验分解为静态的片段，同时也压抑了身体的感官过剩、即兴表达和在场性，深刻影响了记忆的编码方式。在印刷技术的推动下，文字语言叙事开启了历史记忆大众化、世俗化的传播时代，记忆不再是讲述者或抄写者的个性化变体，而是更具标准化和可校验性的公共文本。

历史记忆的文字呈现具有深远的革命性意义，但也具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文字语言作为一种“技术性代具”，使人类自身的记忆能力趋于贫乏。“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5], p. 102)文字符号与现实之间构建联系具有自由性和任意性，因此历史记忆的文字呈现是一种高度的抽象，而非还原式的重现。这既解放了人类的记忆，又导致经验的贫乏和记忆力的萎缩；另一方面，文字语言会导向记忆的垄断。符号与意义之间呈现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关系，决定了文字的接受和使用需要经过长期的训

练。譬如通过教育等形式,让大众习得读写文字的能力,使不同的个体能够加入到共同的文化对话中去。这种对识读能力的前置性要求容易引发文字释经权的垄断。“字母文字作为第三滞留的主要机制和教士神权与政治权力的基础,构成了一种在二十五个世纪里始终保持稳定的记忆术体系。”([4],p.179)历史记忆编码和解码逐渐掌握在统治阶级、官僚机构和僧侣阶层手中,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底层人民的身体经验逐渐被排除在正史之外。“控制书写就是控制记忆,也就是控制社会。”([6],p.300)可见文字语言虽然开启大众化传播的路径,却没有使历史记忆彻底为大众所共同享有和构建。

4. 图像语言:记忆的“直观化”与“意象化”

《现代汉语词典》将图像定义为“画成、摄制或印制的形象”,按照这一内涵,图像的外延既包括雕塑、编织图案、绘画等创作性图像,又包括照片、电影、电视等复制性图像,牵涉的范围极广,甚至与人类思维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7],pp.39-53)。以机械复制技术为基础的图像真正得以打破文字的统治,带来了深刻的认知革命。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图像》一书中将其称为“图像革命”,表明机械复制技术下图像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潜能。

图像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作为记忆留存和传播的媒介而存在。原始社会留存的图腾和壁画、古代社会的画像和雕刻等,都是人类系统化图像传播的最初尝试。这些古老的艺术实践形成了绘画、摄像甚至文字的直接或间接的起源。“没有相关图像或器物的佐证,人类对‘史前史’的撰述和理解都是不可想象的。”([8],pp.28-43)。法国南部阿尔代什省的肖维岩洞中,仍留存着距今三万多年的古老岩画,生动地记录了各种被狩猎的动物形象。这些岩画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直接指向当时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生产实践。这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于洞穴时便开始生产图像,将连续的时间流与多样的身体经验转化为二维平面上一个或多个凝固的画面,并通过反复观看激活经验,实现记忆的留存、再现和传递。然而,在漫长的身体语言和文字语言统治时代,图像在历史记忆中始终只是作为补充的边缘语言,它的在场始终以文字的记忆需求为前提,基本不具备独立的叙事作用。早期修道院手抄本中的插图正是这种现象的物质化呈现,尽管书中包含着大量精美的细密画,但这些图像充当的是文字的视觉辅助符号,而非独立的表意系统。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初步实现了图像独立的记忆职能,为后来图像语言的全面崛起铺垫了漫长的前史。直到19世纪摄影技术发明后,图像才真正能够与文字平等地记录经验、编码记忆。这一时期被本雅明称为“机械复制时代”,在此之前,所有的图像都只是创作性图像。而摄影技术通过精确的光学模拟实现对客观存在的还原式记录和呈现,使图像生产脱离了人的双手,开启了复制性图像的时代,也推动了记忆媒介向图像范式的重要转变。

图像语言具有具体性、直观性和意象性的叙事特征。首先,图像语言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9],p.88)图像呈现的是可辨识的、有形的、个别的事物,而非抽象的范畴或关系,例如文字“树”可以指代所有树,图像中的“树”却是特定的一种甚至一棵,无法直接呈现更多的树种。这种具体性赋予了图像高辨识度和情感附着点,使人类记忆形式更具精确性,也使历史叙事更具可信度;其次,图像语言是一种直观再现对象的语言,补偿了身体语言和文字语言所缺失的等比重现能力。加夫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虽然文字和图像都是属于视觉接受的语言,但是文字的视觉接受只是接受了其符号字形,还必须通过意识转化为言语才能通达意义,因此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间接的。图像的视觉接受是直接的、感性的,图像本身就是意义的一部分,它不再像文字那样依赖线性的逻辑链条和抽象的符号转换,而是通过视觉接受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能够在跨语言符号系统上建立共同语境。这种无中介性推动视觉取代听觉成为语言接受与加工的主要器官,同时也为历史记忆的留存和接受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性;最后,图像语言是一种能指和所指在感知上

融合的意象化语言，既具备可辨识的形态，又能够承载超出自身实存的意义和价值。图像能够通过现实选择性和象征化，形成一个超越具体物象的心理意象，引导观看者调用自己的经验和情感来补全画面未直接呈现的内容。例如，《最后的晚餐》中犹太握钱袋的画面，能够令人联想到背叛、三十块银币和后续的十字架受难。这种意象联想类似于文字阅读中的推理，但更依赖视觉隐喻和图式，而非文字语言的逻辑语法。记忆浓缩为意象而非线性叙事，时间序列中的经验转化为空间布局呈现出来，使记忆摆脱了文字强制性的线性顺序，改变了人们的记忆形式和认知习惯。

成熟的图像语言是近代工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它既延续了身体语言对“在场性”的持有，能够将特定事件凝固为可保存和复制的视觉符号，既让观看者仿佛能亲历事件现场，又克服了身体语言无法跨越时空的局限；同时，它也具有跟文字语言一样的物质化存档优势，同时又以更直观、更少编码和解码障碍的方式呈现记忆内容。这种“直观化”与“意象化”的双重特性，使得图像语言在记忆的构建与传播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效能。从柏拉图到卢梭，西方思想长期存在一种“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语音是思想的直接表达，而文字只是语音的派生物。但复制性图像的出现证明，有一种书写形式不依赖于发音语言，直接记录世界本身。我们甚至可以说，图像语言的出现是人类记忆的一次更为彻底的解放。

5. 结语

语言改变着人体验空间和时间的的方式，不仅塑造着人的思维、记忆和想象，也反映出人类最为原始的欲望，即对历史、记忆的真实性的追求与反思。“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词之书和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的两部书，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书。” ([10], p. 59) 尽管身体、文字和图像在记忆构建中的功能差异显著，但三者之间绝非单纯的范式继承关系，而始终处于长期的相互影响与杂糅之中。无论是印刷术支撑下文字语言对身体语言的规训，还是摄影技术下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收编，都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彻底否定与抹除；相反，每一次“语言”形态的发展都通过对旧有媒介的整合与重塑，为历史记忆的叙事生成成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张力。

图像语言基于技术而形成的“确证性”，为其在历史记忆构建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保障，其叙事功能的广泛实现，正是人类对记忆精确性不断探索的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围绕电影这一核心现象展开研究，探讨了机械复制技术在人类整体感知模式和集体经验转变中的深远影响，折射出艺术和技术背后潜藏的上层建筑问题，为历史唯物主义应对 20 世纪语言媒介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指引。在本雅明的时代，文字叙事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媒介，人们完全无法想象影像会渗透到人类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领域，成为一种新型叙事方式，甚至尚未意识到当时的影像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已远超口语与文字语言叙事。尽管如此，以图像语言为基础的影像仍然在漫长的技术更迭中脱颖而出，它试图恢复身体语言的整体性与运动感，同时利用文字的可复制性与线性编辑能力，为人类记忆解放和集体记忆构建提供全新的叙事范式，本雅明认为这是历史叙事的一条辩证超越之路。

若将目光转至当下数字媒介时代会发现，记忆书写面临着与本雅明时代相似的、更为深刻的范式革命。AI 算法生成历史图片引发的记忆假象，一方面说明了图像语言能够深刻参与人类记忆图景的筛选、排序和生成，悄然重构“哪些记忆被书写”以及“如何被书写”的逻辑，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图像语言在过去一个世纪所支撑起的记忆“确证性”将难以为继。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11], p. 550) 算法媒介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整合民间记忆、边缘叙事与多元视角，为历史书写提供丰富的“行为之书”与“言词之书”素材，若能与人类对“艺术之书”即图像语言的批判性运用相结合，或许

能催生更富整体性与反思性的记忆范式。因此，AI时代的记忆书写同样蕴含着辩证超越的可能，关键在于能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眼光审视算法背后的社会关系，推动技术向善的制度设计，确保精神生产资料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记忆解放而非资本增殖的单向逻辑。同时，本雅明所关注的感知模式转变在AI时代将愈发剧烈，要求我们主动培养媒介素养，在依赖算法便利的同时保持对历史真实性的追问，将技术工具纳入文明实践的长河，使记忆书写既不失精确性与可及性，又不失多样性与批判性。惟其如此，才能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实践长河之中始终为人类历史书写和记忆解开拓更广阔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 方尔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崔林. 媒介的变迁: 从口语到文字[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瑞]弗迪南·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6] 邵鹏. 媒介记忆理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 [7] 龙迪勇. 图像叙事: 空间的时间化[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9): 39-53.
- [8] 龙迪勇.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3): 28-43.
- [9] [美]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 [10] 曹意强. 艺术与历史——哈斯克尔的史学成就和西方艺术史的发展[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1.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